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卅运动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和残酷掠夺之下。中国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当时，中国人民既要忍受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而强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又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的侵略。它们贪得无厌地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大肆地开办工矿企业，直接地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据统计，1895 年至 1920 年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共有 56 个，平均每年开办 2 个；而 1921 年至 1930 年开办的企业就达 56 家，平均每年开办 5 个，速度加快了 1 倍。另外，它们还开办银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严重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据 1924 年美国外交部的最低估计，美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投资额为 9535 万美元（文化事业投资还未计算在内）。日本在华企业投资也超过了 7 亿日元，其中纺织业投资即达两亿日元。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每天至少劳动 12 小时以上，而且劳动条件恶劣，工资低微。在 1919 年前后，除少数技术工人外，每日工资最高不超过 5 角，最低的不及 2 角，甚至还有的不及 1 角，一般是二、三角。可见工人的生活状况多么悲惨！与此同时，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经常处于停工减产状态，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帝国主义者还不断采用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中国农民。据极不完全的估计，帝国主义者 1924 年从中国掠去的银元就达 20 亿以上。中国被这些恬不知耻的帝国主义者称为发财的“ 天堂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军阀政府完全是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扩大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纵容和支持各派军阀长期混战，中国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因段祺瑞是安徽人，安徽又称皖，故名），同时又支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因张作霖是奉天人，故名，奉天即今辽宁一带）英、美帝国主义则支持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直是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冯国璋是曹、吴之前的直系军阀头子，因其为直隶人，故名）。除此之外，全国尚有许许多多地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拥兵自固，扩充地盘，争权夺利。

1920 年至 1924 年，大规模的军阀内战就有 5 次。军阀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作军费。1923 年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实际占财政总支出的 64%。由于战乱不断，抓丁、拉夫、征兵、抢粮、征租、苛捐，甚至奸淫、抢劫、烧杀，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1925 年，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 5 省发生大灾荒，“ 流亡遍地，茹愤衔冤之气，啼饥号寒之声，几于上彻九天，下通九地 ”。争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逼得人们活不下去的状况了，他们要起来，

要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从 1840 年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时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过。从三元里人民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虽然极大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由于没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全新的面貌。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的制定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工人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始于香港海员大罢工，止于京汉铁路罢工。其中影响较大的罢工还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等。

罢工浪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但也受到了它们残酷的镇压。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正在进行的时刻，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法帝国主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50 多人被杀害，300 多人受伤，60 多人被捕，制造了“二七惨案”。随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告诉人民：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凶恶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同盟军和武装力量。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正陷在苦闷之中。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正式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实现后，显示出民族力量的新团结，一个包括全国各族绝大多数人民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 年 7 日，共产党领导广州沙面租界工人进行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这是“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又一高潮的起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士气。与此同时，共产党通过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积极推动农民运动。1924 年 7 月，共产党人彭湃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两年共办 6 届，培养了近 800 名农民运动的骨干。彭湃在广东海丰、陆丰一带，

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一带领导开展农民运动。

以 1924 年 5 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契机，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这是一个包括有不少上层人士参加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各地纷纷组织反帝同盟，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和宣言，展开反帝废约宣言。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三种压迫手段来压迫中国国民，才造成中国今日这种军阀割据，兵匪横行，实业不振，教育衰败，农弃于野，商歇于市，全国扰扰，民不聊生的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反动的军阀政治为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工具，……奉迎帝国主义的意旨，执行种种卖国害民的工作。所以我们一面向帝国主义宣战，同时也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军阀宣战。……全国被压迫同胞们，……我们应该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我们先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做起，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这次运动起到了动员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抓住孙中山离粤北上的时机，在全国发动了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各重要城市和人民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促进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在最短期间召开国民会议，使本次运动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反军阀争民主运动。1925 年 3 月 12 日，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全国又迅速开展了追悼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活动。

针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于 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案》等决案，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得到胜利。农民问题特别重要，必须尽可能发动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必须把职工运动统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抓紧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和大都市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赶紧组织工厂等处的党支部等。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共四大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反帝大风暴即将到来。

二、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 16 个商埠抢开了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建立起殖民统治，形成“国中之国”。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均有租界。在租界内，帝国主义者可以任意打人、杀人、捕人，而中国人在租界内根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只有纳税的义务，经常被歧视凌辱。在公园门口，就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者还在上海开办工厂，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上海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集中的地方。“五卅”运动前夕，上海工人就有80多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frac{1}{3}$弱。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上海工人同全国工人一样，经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要求革命最迫切，人数也最为集中，便于团结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教育和组织工作。

早在 1921 年 8 月，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总部设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在上海工人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1923 年 8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党内劳动运动委员会和公开做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合并为一个机构，统一负责上海的工人运动。这时，党在上海的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等区陆续开办补习学校，通俗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工人斗争。最为活跃的是沪西小沙渡一带。1924 年，党选择了沪西小沙渡和沪东扬树浦作为工作重点。

沪西小沙渡是钞厂工人区，产业工人十分集中。那里也是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日本纱厂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三、五（分东西二厂）、七、八、九、十、十二、十五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日本纱厂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是异常残酷的。这些厂工人的工资比其它纱厂低，一般每天只有二、三角钱，最高的也不过是四、五角，最低的还不到一角。这样少的工资不用说养家糊口，就连自己也吃不饱。虽然挣得少，但干活却不少，一般工人每天都得连续工作 12 小时，另外还要加“礼拜工”。日本资本家还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如“存工”。工人进厂要先做半个月“存工”，而“存工”工资须在停工后半月发给。如果无故停工和停工后半月内到其它厂做工的都不发给，实际上，“存工”，是无报酬地为资本家干活。日本监工还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辱骂中国工人是“贱种”、“亡国奴”，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甚至连上厕所都没有自由。工人们早把日本资本家恨透了，早想组织起来反抗。

共产党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基础好的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党派李启汉、嵇直、徐玮先后开办补习学校，邓中夏、李立三等亲自授课，启发工人觉悟。1924 年夏天，邓中夏（生于 1894 年，时任中共中央全国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2 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等同志

按照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原补习学校、平民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地点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槟榔路（今安远路）口拐角上的3间平房里。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开办了补习学校，并经常举办讲演会和各种游艺会，很受工友们的欢迎。俱乐部成立不久，任俱乐部秘书嵇直调往外地，组织上派刘华接任秘书，和俱乐部主任孙良惠一起负责俱乐部的工作。刘华原名刘剑华，四川人，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当学徒工，后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他在邓中夏等人的引导下，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5年12月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他到任后，俱乐部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邓中夏、恽代英、刘华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耐心细致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他们向工人介绍了安源工人斗争的先进经验，鼓舞工人们组织起来，加入俱乐部，团结在一起，准备斗争；他们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反动军阀的腐朽，帮助工人们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特别注意培养工人的积极分子，引导他们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他们还教工人唱一些革命歌曲，受到青年工人的欢迎，其中有一首“青工歌”流传较广，歌中唱到：“青年身体未长成，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钿，打骂又罚工，开除由他便，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资本家，不做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工养他们。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世界属我们！”这首歌唱出了工人们的心声。

俱乐部的发展迅速。到1925年2月罢工发生前，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会员已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1000余人，在19个厂建立了俱乐部小组，并在积极分子中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一批工人运动骨干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

革命的真理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共产党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中播撒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1925年2月2凌晨5时许，内外棉八厂夜班工人已经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粗纱间一个12岁的瘦小女童工累得精疲力尽，就靠在车头上打起瞌睡来。不料被日本项班撞见，将童工踢伤在地。童工的姐姐急忙跑过去和日本领陇评理，反而挨了重重的两记耳光。男工们挺身而出，高喊：“不许打人！”并大声指责日本领班。日本领班趾高气扬，冷笑一村：“你们男工的不服气？你们不想干啦！”果然一小时后，厂里贴出布告，把粗纱间夜班的50个男工全部开除。日本资本家的如意算盘是将敢于斗争的男工乘机开除，用养成工顶替，不时除掉隐患，使大事化小，还可逞现淫威。但觉悟起来的工人们与资本家的主观愿望相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工人们奔走则告，粗炒间的日班男工听到

消息，首先自动罢工。坚决表示与夜班兄弟同进退。许多积极分于跑到沪西工友俱乐部找刘凶 a 志，要求俱乐部为工人撑腰，发动大摇班（即罢工），刘华）即向上级组织汇报请示。

中国共产党接到报告，很重视这次工人反抗斗争，霍秋白。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刘华等开会讨论，认为这次罢工斗钟能否胜利是上海工人运动能否开展的关键，决定动员上海 t 体共产党员行动起来，投入这次斗争。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由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及李立三总负责。

党组织又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对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一面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先领取该领的工资；一面派骨干分子到各日本纱厂进行活动，散发传单，联络组织。与此同时，党又决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向厂方提出 6 项要求：一、不准日本人打骂工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被开除的工人必须全部复工，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六、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说出了广大工人的心里话，被印成传单，分发到各厂，发动各厂工人参加罢工。

2 月 9 日下午 4 点，日夜班将要交接班之前，内外棉东五厂各车间同时敲响了水汀管（这是事先约定的罢工讯号），工人们立即关车，高呼“ 摇班啦！ ”冲出车间。日本资本家见势不妙，将所有的厂门都上了锁，不准工人出门，并加强警卫，巡捕房也派来巡捕。工人们不顾阻拦，从厕所间的窗口爬了出去，内外呼应，将门锁打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场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五厂工人一发动，七厂、八厂和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了。工人们出厂后，渡过了苏州河，汇集到潭子湾。潭子湾不属租界，是一片荒野，开展活动比较方便。各厂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在这里召开了集会，近 1 万人参加。会场上，竖起写着斗大的 7 个字：“ 反对东洋人打人！ ”这个口号道出了工人身受的痛苦，反映了工人强烈的愿望。大会由刘华同志主持，李立三、邓中夏、杨元华等同志讲了话。会议重申了 6 项条件，并号召工人们坚持到底。

与会的工人们情绪高昂。当他们听了热情的演说以后，纷纷地将厂里发给男工的日本式小鸭舌软帽脱下扔在地上，再用脚践踏，并狠狠地说：“ 我们中国人再也不戴这东洋帽了！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 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 ”“ 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 ”“ 齐心奋斗，坚持到底！ ”的口号声。在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中，刘华同志当场宣布组织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号召工人听工会指挥，统一行动，争取罢工的胜利。全场 1 万余只手臂高高举起，一致表示拥护。

当天晚上，工会就召集各厂代表开会，研究进一步扩大罢工的问题。接着，纠察队组成了男工 53 队，每队 10 人，队有什长，每 10 队有百长，再以

上有总队长，队员佩带一条小白布，上面印着蓝色的纱厂工会纠察队的图章。纠察队马上就在俱乐部、谭子湾渡口和各交通要道布置岗哨（工人口头语叫做“把口子”），维持罢工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一向被日本资本家称为“驯服的奴隶”的女工们，在党的教育和男工们的带领下。也挺起胸膛，勇敢地参加到罢工斗争中来，组织了女纠察队 14 队和男工们一起把口子。这对工人们是一个极大地鼓舞和有力的支持。

2 月 10 日，罢工工人高举“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等旗帜，像一阵狂风卷入租界，先来到内外棉九厂门口，边喊口号，边发传单，九厂工人听到喊声立刻关车，突破东洋领班和工头的阻拦，冲出厂门，与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然后又游行到内外棉十三、十四厂。厂内工人立即冲出厂去，参加罢工，后与巡捕发生冲突，队伍被冲散，十几个工人被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罢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参加的工人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到了 12 日，内外棉在上海的 11 个工厂，1.5 万多工人，全部参加了罢工。这股风潮很快波及到日本。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等日本纱厂，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大多数卷入了斗争。到 18 日，参加罢工的有 22 个日本纱厂，共 3.5 万多工人。

一向趾高气扬不把中国人当做人看待的日本资本家根本没有想到开除几十个中国工人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所以他们尽其所能，想方设法破坏罢工。16 日，内外棉纺织会社社长专程自日本来上海策划破坏罢工。18 日，上海日商纱织联合会开会研究破坏罢工的策略，并电请日本政府出面干涉。20 日，日本政府指令日本驻华使馆，向北京政府，上海地方官厅交涉，要求取缔罢工。同时，日驻华使馆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命令上海地方政府从速遏止纱厂工潮。

但这时，全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很高，各界人民都同情罢工，北京政府也有些顾虑，不敢过分压迫。

23 日前后，日本政府甚至增调军舰两艘来上海进行武装威胁。除此之外，日本资本家还收买雇佣流氓、工贼包括黑社会成员到工厂里挑拨是非，引起争端，妄图分化瓦解罢工工人。他们还企图利用罢工工人生计困难，引诱工人复工，宣布罢工期间凡是到厂报道的，不论开工不开工，每天发给三小时工资。这些阴谋都一一破产了。

与日本资本家反扑罢工相对照的是，上海各业工人和各群众团体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罢工斗争。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 5 个工会发表通告，表示支援，并致函政府当局，力争罢工自由。上海恒丰纱厂、溥益纱厂等工厂工人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等 40 余个团体共同组织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在上海，掀起了一个支援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

罢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据东京《朝日新闻》估计，单是内外棉 11 个厂，直接损失即达 50 万日元，加上间接损失，将达 100 万日元

以上。无计可施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表示愿意和工人谈判，商议复工。2 月 25 日，谈判正式开始。经过斗争，日本资本家只得承认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一、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金奖金照章满 5 年发还，未满 5 年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四、工资两星期发一次。被捕工人，分由商会与工人律师保释。

27 日，被捕的工人恢复了自由。接着，各日商纱厂的工会发表复工宣言，号召工人回厂工作，加强团结，维护工会。各纱厂工人陆续复工。3 月 1 日，内外棉纱厂全体工人个个面露喜色，齐集潭子湾，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华同志激动地说道：“ 工友们，我们胜利了，这次虽然没有增加工钱，但是东洋老板第一次向我们低头，被迫答应以后不再虐待工人，并且在事实上承认了我们的工会。这个胜利是我们奋斗得来的，是我们团结的结果。今后我们还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工会，把工会办得更好。并应提高警惕，严防日本资本家破坏复工条约，对工会和工人施加迫害。 ”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 2 月罢工，大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和号召力。工会的威信和凝聚力也大为提高，加强了工人的团结，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团结战斗的重要性，工人们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由 1000 人增加到 6000 人，杨树浦的会员增加到 3000 人。根据工会会员迅速增加的形势，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健全、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按照日本纱厂各企业系统，建立了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等纱厂工会，在各厂设立工厂委员会（即分工会）和工会小组，为以后的战斗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2 月罢工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初步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这次罢工在政治上灭了日本资本家的威风，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到了复工那天，工人们个个昂首挺胸，大踏步跨进厂去。平时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领班，这天也不得不陪着笑脸，把工人领进车间，请大家开车做活。

总之，2 月罢工为上海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对推动青岛等地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邓中夏认为：“ 2 月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2 月罢工是上海工人在 1925 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是“ 五卅 ”运动的前奏。

在上海 2 月罢工的积极影响下，与上海同一部门的一些青岛日本纱厂也掀起了罢工浪潮。在 4 月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青岛大康纱厂发动工人秘密组织工会，被日本资本家发现。日本资本家有上海 2 月罢工的前车之鉴，决定先发制人首先开除工会发起人，逮捕工会活动分子，进行毒打，以便达到解散工会的目的。4 月 19 日，大康纱厂工人举行了罢工，提出承认工会、不得打骂工人、增加工资等条件。紧接着青岛内外棉厂、隆兴、日清等厂也响应罢工。上海纱厂工人汇款并派人直接到青岛支援。上海纱厂工会发表公

开宣言并写信警告日本资本家：“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日本资本家害怕工人罢工，不得不接受青岛工人提出的一些主要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5月10日，青岛纱厂工人胜利复工。

上海和青岛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一场更大的斗争风暴即将来临。

日本资本家是绝对不甘心失败的。上海2月罢工期间，日本资本家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向工人作了一些让步，答应了一些工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妄图扑灭已经燃烧的革命火焰。他们收买了工贼，组织了御用的工会——工人友谊会，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对抗。到了4、5月间，日本资本家发动新进攻的计划也在加紧进行。他们利用棉价上涨、纱价下落的时机，拒不履行2月罢工自己亲手签订的协议，故意克扣工人工资，拖延工资发放时间，甚至又开始打骂。开除工人了。在此关键时刻，工会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工人利益。1925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内外棉纱厂工会根据复工条件，与日本资本家交涉，提出3项要求：一、依照每两星期发放一次工资的规定，5月2日应发放工资；二、工资零数照大洋计算；三、5月1日午后停工半日，不扣工资。

日本资本家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了工会的要求。同时，一部分工人又进行了罢工抗议。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把工会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工会。5月7日，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召开会议，认为纺织工人的长期不稳定，是由于共产党人组织工会造成的，“日前如不加以排斥，则工会基础有更形巩固之虞”。会议决定：“日本纺织同业会”不能承认此种工会，工人如有要求时，可直接向会社提出，同业会与此类工会一无关系；假如由于这一决议的结果，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闭工厂；为了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活动，应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厅交涉。

日本资本家背信毁约、取缔工会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工人们异常愤怒。内外棉三厂、四厂和十五厂的工人接连发动罢工，其他各厂工人也准备行动。

5月10日，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了罢工工人及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干部大会，认真分析了形势，制定了斗争的策略。会上，与会代表情绪激动，多数人主张再来一次“大摇班”，煞煞帝国主义的威风，长长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刘华同志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深思熟虑地指出：“目前市场上棉价高、纱价低，东洋鬼子正利用这个机会，阴谋用关厂办法来对付我们，要是‘大摇班’，就会中敌人的圈套。所以，现在可以用做得慢的怠工办法来斗争。”与会同志同意了刘华的意见，一致同意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采取轮流罢工和怠工的形式。随之，内外棉第三、四、八、十二、十五厂、同兴第一厂、日华第四厂等工人按照党和工会的指示，纷纷由罢工转为怠工和轮流罢工，使斗争此起彼伏。

日本资本家先利用巡捕和警察进行武力干涉，但对随之而来的工人怠工

却束手无策，只有把气出在工会身上，大批开除工会活动分子。在内外棉各厂，凡发现有人征收工会会费，就立即开除。5 月 11 日一天，就有 31 人被开除。5 月 14 日上午，内外棉十二厂又张贴布告，胡说细纱间工人孔小二子和孔金舆“ 散布工会谣言，煽惑人心 ”，将他们开除。当工人们推选 5 名代表与厂方评理交涉时，日本资本家又勾结巡捕，公然逮捕了这些代表。对此，十二厂工人忍无可忍，立即罢工反抗，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

十二厂的罢工直接影响到相连的内外棉七厂。因为七厂是织布厂，要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时，党和工会决定其他厂工人暂不罢工，特别是七厂工人要坚持照常上班，以加重日本资本家的压力，支持十二厂工人的斗争。

5 月 15 日，七厂的日班工人照常进厂上工。可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不让开工，并要求他们劝说十二厂的工人复工。工人要求照发当天工资。经调解，先发 5 个小时的工资。当天下午 5 点多钟，七厂的五、六百夜班工人照常来上班，可日本资本家却将大门紧闭，不准工人上工。工人们要求日本资本家开工或照发工资，但日本资本家置之不理。这时只见一个青年工人从人群中奋不顾身挤上前，带着一群青年工人猛敲大门，并高声叫喊：“ 快开门，我们要上工！ ”不发工资不回去！但是，厂里还是一点声息都没有。有的工人气得就搬起石头，使劲地往门上砸。这下，躲在门内的日本人才着了慌，从洞口伸出脑袋来说：“ 厂里没有纱做，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过两天再来上工。 ”愤怒的工人再也不能等待了，他们在顾正红的带领下，奋力撞开大门，涌进工厂。

厂里的日本领班一见工人进了门，就轮起铁棒、木棍滥打工人，并急忙给厂主打电话，要求增援。当场，就有好几个青年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等看到这情景，一面高喊：“ 东洋人打伤人啦！东洋人打伤人啦！ ”一面带了一部分工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拿了一根打梭棒以备自卫。

这时，内外棉厂的副总大班（邓今副总经理）元木、七厂的大班（经理）川村等接到电话，带着一帮打手，个个手拿武器，杀气腾腾地朝工人们冲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工人们面无惧色，勇往直前，共产党员顾正红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带头高呼：“ 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元木、川村等人一看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早就注意的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就立即向顾正红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顾正红咬紧牙关，忍着巨痛，高呼：“ 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 ”突然，敌人的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小腹，鲜血直流。顾正红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鼓励工人们继续坚持战斗。刽子手川村又对他连开二枪，一个打手还用刀猛砍他的头部，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之中。与此同时，有 10 余名工人被打伤。

工人们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把顾正红送到了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年仅 20 岁。

顾正红同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 1905 生于江苏滨海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1921 年 10 日逃荒来上海，在上海内外棉七厂当工人。在 2 月罢工时积极参加，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正红被枪杀，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凶相毕露，大大激发了内外棉各厂工人以及广大人民的反帝斗志，“ 为顾正红报仇 ” 的呼声传遍了全市。5 月 15 日晚上内外棉厂工人纷纷集会罢工，厂工会连夜行动，两次向全国各工会、学校、报社发出宣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号召全国同胞支援工人斗争。宣言宣告：“ 敝会会员顾正红君又惨死于日人手枪之下，不仅敝会所深痛，亦即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此仇不雪，国亡无日矣！各界同胞必深同愤，请以全力为我后援。 ” 工会还提出了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要求，并派代表到学校和各团体进行宣传。

5 月 15 日晚，中共上海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并派李立三赴小沙渡了解有关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情况和斗争形势，中共上海地委当晚决定一面扩大罢工，一面发动各界援助，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第二天，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 1 万多工人一齐罢工，在潭子湾集会，控诉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并组织起来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交际队、演讲队和救济队。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呼吁各地同志立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党又通过 “ 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 ” 联合上海工、学界等 35 个团体首先组织了“ 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 ”，发表宣言、散发传单，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支持工人的斗争。

18 日，顾正红的遗体从租界运往谭子湾时，男女工人列队往迎，“ 要行凶者偿命！ ”“ 坚持罢工到底！ ” 的呼喊声不绝于耳。下午，党又在谭子湾 “ 沪西工友俱乐部 ” 门前召开有 4000 多工人参加的大会，顾正红的灵柩被抬到会场，搭台吊祭。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枪杀顾正红之后，对风起云涌的上海工人运动又进一步采取镇压和破坏活动。日本纺织同业会连续几夜开会，密商对策。日本资本家则派日侨商会会长回国，去向政府报告罢工风潮。日本政府要求驻上海、青岛的日本官宪，迫使中国军阀取缔工会，镇压罢工。驻沪日本总领事要求中国官厅 “ 防范 ” 罢工，取缔工会，并威胁说，如果中国官厅无力应付，日本将自行派兵来华镇压。他还警告上海租界各中国报纸，不准刊载有利工人斗争的消息，违者将封闭报社、逐出租界。所以，对顾正红被枪杀以及工人的罢工斗争，一般报纸都不敢如实报道。军阀历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淞沪警察厅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要求，解散罢工策源地沪西工友俱乐部，并训令各所属区署队 “ 如有工人聚众罢工以及煽惑等事，务请特别注意，严行遏止。 ”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发出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 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 ”。为此，要求各地共产党员 “ 即邀当地 C．Y．（即党、团组织），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

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事件为限。”为了将顾正红被枪杀真实情况公诸社会，冲破帝国主义的压制，扩大斗争影响，进一步动员广大市民参加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来，党决定 5 月 24 日在谭子湾举行全市规模的公祭顾正红烈士的追悼大会。

5 月 24 日，公祭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隆重举行。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幢和各个工会的匾额，中间悬挂着顾正红烈士遗像，中间白色的帷幕上有刘华亲笔书写的横额和挽联。横额是：“工人先锋”。上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是：“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在帷幕后面放着烈士的灵柩，上面覆盖着一块洁白的绸子，上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8 个大字。守卫着灵柩的是由 20 个工人组成的纠察队。参加追悼大会的有工人、学生、市民多达 1 万余人。大会气氛悲壮。由刘华任总指挥。会上，宣读了祭文，介绍了顾正红烈士的生平及遇害经过，分头进行了讲演，指斥了日本资本家的罪恶。“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支援日本纱厂工人！”“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口号，响彻会场上空。这次大会成了动员各界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会。

烈士的鲜血唤起了人民的觉醒。首先起来支援工人斗争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同工人一起演讲、募捐，进行了有力地宣传。23 日，文治大学两名学生因上街募捐被无理逮捕。24 日，上海大学学生在前往潭子湾参加顾正红烈士追悼会，路过租界时被抓去 4 人。租界当局并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决定于 5 月 30 日进行审讯。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前往租界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拒绝。

27 日，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厦大学、同德医专等 32 个学校的代表，在恽代英主持下，讨论学生斗争策略问题。会议通过 3 项决议：1．通过传单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的真实情况；2．募捐援助因罢工而急需救济的工人；3．现在被拘押的学生，如果到 5 月 30 日尚未恢复自由，应采取措施，设法营救。同日，上海南洋大学等 60 余个团体的代表开会讨论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上海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常年大会上，准备提出 4 个提案。即“增加印刷附律案”、“增加码头捐案”、“交易所注册案”、“改善雇用童工案”。“增加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包括报纸、小册、传单、书籍、小张张贴等，必须向工部局注册，否则将予以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规定严重钳制了中国人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扼杀中国人民的文化出版事业。“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凡租界内之人，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货物下船转运，均可扣捐。并将码头税增加了 50%，严重加重了工商业者和市民的负担，使中国工商业被压制。“交易所注册案”规定，凡中国人在租界开设交易所，必须把注册办好，到工部局注册，否则不准营业。“改善雇用童工案”则妄图使雇用 10 岁以上的童工合法化。这四个提案不仅侵犯中国的主权，而

且也有损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所以上海各界人民强烈反对这 4 个提案。纳税外人常年大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通过提案。

工部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顾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对，准备于 6 月 2 日再召开会议通过 4 提案。上海人民反对 4 提案的斗争更加激烈。这时，上海人民反对租界越界筑路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这些斗争与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迅速结合起来。形成了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浪潮。

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恽代英、蔡和森、郭景仁、黄正广、李立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党应采取的策略，与会的绝大部分同志认为，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正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党组织应积极地领导社会各阶层人民，把工人的斗争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力量，掀起一个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李立三在发言中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校起来援助工人。蔡和森提出要向各方面活动，争取同情。会议明确提出，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把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会议还作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1．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2．向学校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回去；3．印发传单——包括揭露外国人侵略中国的一切事实；4．于 30 日下午上街演讲示威。蔡和森根据会议的策略主张，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随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5 月 29 日，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发表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投入到反帝斗争中去，并选派优秀工人，组成了 30 日赴租界演讲队。上海学联和工会的代表，分别深入到各工厂、学校进行宣传，并告以 30 日全上海学生集中到公共租界讲演。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组织了演讲队，拟定了演讲大纲，选定了演讲地点。上海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为 30 日的战斗紧张有序地准备着。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事件，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使已经出现的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为燎原的熊熊烈焰，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三、空前的反帝怒潮

5 月 30 日上午，已做了充分准备的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演讲队，分头到公共租界的各个路段进行演讲，散发传单，演讲队员计有 3000 余人。由南洋大学（后改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组成的演讲队在会审公廨和北火车站一带演讲，周围挤满了听讲的群众。在帝国主义租界的心脏地带南京路，变成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宣传阵地。到处是工人学生的演讲队，到处是被演讲队演讲所激怒的群众。演讲队成员有的在街头，有的分散在商店，有的挥舞着写着各种反帝标语的小旗，愤怒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的反动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中国的事实。队员们还在各商店的橱窗上，电线杆上，电车上张贴传单和标语，有的向群众散发救援被捕工人、学生的传单。队员们还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抵制日货！ ”“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 反对越界筑路！ ”“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在华一切租界 ” 等口号。

在散发的共产党拟定的《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中写道：“ 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我们希望全上海的中国人闻风起来！我们希望全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同胞闻风起来！ ”

听讲的群众很感动，有的热烈地鼓掌，有的和演讲队员一起高呼口号，有的帮演讲队员维持秩序，有的帮助散发传单。演讲声、口号声汇合成强烈的反帝吼声，震动了整个租界，震动了整个上海，震动了中国大地。长期压抑在人民心底的怒火，一发而不可收拾。

而对波涛汹涌的反帝浪潮，帝国主义者感到他们的殖民统治受到了莫大的威胁，在觉悟的工人、市民、学生面前着慌了，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各国的巡捕房都派出大量的巡捕，像疯狗一样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用警棍往群众身上乱打，驱赶演讲的学生和驱散围观的群众。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是，示威的群众并没有被帝国主义者的淫威吓退。巡捕在这里赶，示威的工人学生就往那边涌。这儿刚刚被强行驱散，那儿又重新集结起来。禁止也禁止不了，赶也赶不动。气得巡捕无计可施。

下午 2 点多钟，南京路英帝国主义的老闸捕房，公然将在附近演讲的 3 个学生拘捕，他们以为只要一动真格的，逮捕几个，示威宣传就可平息。谁知，拘捕激起了更大的波澜。立即就有大批演讲队员和群众涌到巡捕房门前，要求一起坐牢。

南京路老闸捕房抓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路演讲队立即停止宣传，从四面八方向老闸捕房一带集中。捕房门前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连捕房的天井和甬道也挤满了示威的群众。南京路上的交通也被阻断。

这时，帝国主义的巡捕仍在不断地捕人，许多示威群众被押进巡捕房，

光上海大学被捕的学生就有 100 多人。巡捕还到处挥动警棍，妄图驱散示威群众。

汇合到巡捕房处的示威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巡捕毫无惧色，不断狂呼：“ 释放被捕同胞！ ”“ 打倒帝国主义！ ”“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等口号。巡捕房里的拘留室也是吼声震天，被捕学生、工人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下午 3 点多钟，老闸捕房被迫释放了 100 多名学生和工人，但另外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们被关在里面。这时，被释放的学生不肯离开，他们和在捕房门前的示威群众汇合起来，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要求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和工人。这种情况下，巡捕竟然用灌了铅的警棍和手杖肆意殴打、驱赶群众。可群众仍坚持斗争，就是不散，并坚决要求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

恼羞成怒的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头子爱活生，竟下令所有的巡捕一起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实行血腥屠杀，群众纷纷倒在血泊里，南京路上即刻血流遍地。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共青团员、同济大学机师科学生尹景伊等 13 人被打死（当场死 4 人，重伤后牺牲 9 人。共 13 人，其中学生 3 人，职工 9 人，商人 1 人）。重伤数十人，轻伤者无数。牺牲的 13 人中，年龄最小的邬金华，只有 15 岁，最大的是王纪福只有 36 岁，其余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

上海的《新闻报》生动记载了尹景伊英勇战斗的感人事迹：“ 尹中弹后，初不觉，仍高立演讲。第二弹洞其胸，仍未觉，演讲如故。到第三弹中脑，始仆地而绝，而口中则仍演讲未断也。 ”何秉彝中弹倒地后，口里还在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 中华民族万岁！ ”

凶恶残暴的杀人凶手，很快从马路上移走了烈士的遗体，用水龙头冲洗马路上的血迹，企图以此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上海初创的友联影片公司创办人陈铿然和摄影师不顾生命危险，赶到现场抢拍下了帝国主义者正在冲洗血迹的场面，为揭发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罪行，留下了铁证。南京路上革命烈士的鲜血被敌人冲洗掉了，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却是冲洗不掉的。

南京路上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帝国主义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惨案发生后。各群众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纷纷拍电报给全国各地，揭露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罪行。因为电报中把 5 月 30 日用“ 五卅 ”两字代替，所以人们就把 5 月 30 日的大屠杀称为“ 五卅惨案 ”。

“ 五卅惨案 ”震动了全上海、全中国！

顾正红的血迹未干，南京路上又染红了革命者的鲜血。帝国主义者的大屠杀，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抗。中国人民的选择只有一个：坚决干下去，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正如当时的诗人柔石在《战》这首诗中所写：

呵！
战！
剜心也不变！

砍头也不变！
只愿锦秀的山河，
还我锦秀的面！

“五卅惨案”掀起了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反帝怒潮。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和制定进一步斗争的策略。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报告工人的情况，恽代英报告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王一飞报告学生方面的情况。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并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进一步放手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掀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斗争高潮。会议还特别成立了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专门领导这次斗争，并派出干部到各群众团体进行工作。会议还决定立即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出版《热血日报》。这次会议，为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5月31日，按照党的指示，工人学生陆续到租界示威游行、演讲宣传、散发传单，鼓动上海人民参加“三罢”斗争。沪西的工人宣传队，从潭子湾工会出发，到租界各马路去鼓动商界罢市。工人们一个个精神焕发，忘记了昨天的疲劳，拿着传单，举着小旗，拎着浆糊桶，分头出发了。沿途中只见工人和学生的宣传队有的在慷慨激昂地演讲，有的在与过往群众交谈，有的在散发传单等宣传品，有的在电线杆上、墙壁上、橱窗上、电车的车身上张贴反帝标语……向警予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南京路演讲，鼓动罢市。这一天，南京路一带，帝国主义戒备森严。但工人、学生仍然顶着狂风，昌着大雨，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屠杀，奔走呼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

争取商界罢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月31日下午3时许，上万名学生、工人包围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商会下令罢市。由中小商人组成的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认为大势所趋，首先表示赞成罢市。纳税华人会接着也表示赞同。只有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买办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海总商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罢市。聚集到这里的工人、学生见总商会迟疑不决，就由学生代表林钧主持，召开市民大会，并推荐了代表向总商会交涉，要求他们罢市。经过二、三小时的交涉，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宣布致电军阀政府，报告惨案经过，请求严重交涉。在场的工人、学生坚决反对商会的做法，一定要总商会同意罢市。在群众的包围和强大压力下，直到晚上10时，方椒伯迫不得已，才勉强签署了6月1日总罢市的命令。

工人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5月31日晚，经上海工会联席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推举李立三、刘华分别为正、副委员长，统一领导上海各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自6月1日起实行全市总罢工并发表总罢工宣言，提出了7项条件：

1．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

2．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

3．禁止殴打工人；

4．改良工厂卫生；

5．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

6．不得雇用外国巡捕；

7．反对印刷附律。

6月1日、上海全市实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界罢市，上海各阶层人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洪流，将反帝怒潮推向了一个新高峰。这天，上海大学、南洋大学、上海法政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大专院校和绝大多数中等学校，纷纷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上海大学在通电中说：“本校亦于6月1日起实行罢课，誓达惩凶雪耻之目的，还望全国各界一致响应。”

6月丨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三厂、四厂、九厂以及志公茂纱厂、英商美艺术器厂等1万多工人，华商恒丰纱厂3000多工人和中华书局的工人，早已发动起来，实行了罢工。英商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的中国职工也进行了罢工。同日，公共租界的大小商店都停止营业。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店也纷起响应。罢市范围之大是上海开埠以来没有的。

“三罢”斗争在进一步发展。

6月2日，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也加入了斗争行列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等学校，其中还多为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宣告罢课，并与校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月2日起，总罢工的人数每天都在成万地增加。

6月2日，日商内外棉、同兴、上海等纺织厂，英商电车公司、英商怡和、东方纱厂，甚至工部局直接管的工厂——杨树浦发电厂、工部局总铁厂等厂工人也都举行了罢工。到了6月3日，公共租界的外商工厂已大部分卷入总罢工。6月4日，罢工又扩大到外商银行、洋行、报馆等企业。到了6日，罢工人数达到20余万。

工人罢工的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办的纱厂、烟厂、银行、码头、电报、电话、电车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入瘫痪，给外国资本家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罢市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在罢市以后，在一面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等，并拒绝巡捕逼他们开市。

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迅速实现，标志着上海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反帝的伟大旗帜下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了空前的反帝怒潮。但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各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

6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上海应当马上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会后即由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出面，联合各马路

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发起筹备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资本家虞洽卿竭力阻挠和破坏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他竟说：“各走极端，势必弄成僵局，本会今日之不加入，即为将来调和之余地。”

6月4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个团体各派6名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这个组织，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小商人和小手工业主）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联合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其中的支柱是上海总工会。这一组织的建立，宣告了上海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说明了“五卅”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创刊，它在舆论导向、宣传等方面，及时有效地指导了人民的反帝斗争。

6月6日，中共中央在《向导》上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中共中央还指出，这次斗争，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共产党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号召他们坚持到底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的斗争，以使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为五卅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表了宣言，指出上海的“三罢”与上海市民的生存及中华民族的独立，均有重大关系。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经过各群众团体的反复协商，宣言提出了解决“三罢”、与帝国主义谈判的17项条件。这些条件是：

1．宣布取消戒严令；

2．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3．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4．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以上4个条件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5．惩凶。从速交出主谋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6．赔偿。因此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包括死伤者、罢工、罢市和学校被害者，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7．道歉。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声明道歉，并保证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8．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9．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10．优待工人。应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11．捕房应添设华人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12．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13．制止越界筑路；

14．收回会审公廨（附款略）；

15．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代表会，应有华人席位；

16．取消领事裁判权；

17．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以上 13 个条件为正式条件。

这 17 项条件代表了当时上海人民包括工、商、学各界的心声和利益，也是上海人民“五卅”运动的斗争纲领。它体现了工人阶级自觉地把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此后，“三罢”斗争就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在中国人民的“三罢”反帝怒潮面前，帝国主义者采取了更为卑鄙的手段进行镇压。

6 月 1 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开会决定对付“三罢”的方针是“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扑灭任何对工部局权威的挑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于最短期内扑灭当前的运动。”从 6 月 1 日起，各帝国主义国家陆续增调军舰，至 8 日，黄浦江上就有外国军舰 26 艘。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铁甲车队、骑巡队、武装巡捕、万国商团纷纷出动，对上海人民进行屠杀，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到 6 月 10 日止，帝国主义者在上海 9 次屠杀中国人，被枪杀者 60 余人，重伤 70 多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帝国主义的凶残屠杀，使中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工人们气愤地说：“大英法兰西，东洋与花旗（指美国星条旗），都是帝国主义坏东西，我们中国工人统统要罢工！”从 6 月 5 日起，罢工又由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厂发展到分散的小厂和手工业工人，甚至连外国人家里的男女佣工也都罢了工。甚至海员、码头工人也都响应了罢工。到 6 月 13 日为止，全上海参加罢工的人数共达 25 万人。租界内工厂停工，电灯不明，电车停驶，电话不通，食品无人供应，一片混乱。与此同时，罢市斗争也越来越大。学生罢课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绞杀“三罢”斗争的目的，在采取武力的同时，还玩弄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伎俩，进行破坏活动。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北洋军阀

政府假惺惺地派出两个特派员到上海进行“调查”、“慰问”。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要求特派员根据他们提出的17项条件向帝国主义交涉，而特派员拒不出席会议，欺骗人民的面目被揭穿。美国驻华代办为了本国的利益，打着“调查”、“调解”的幌子，组成了一个由美、英、法、意、日、比6国驻华公使的“沪案六国调查委员会”，赴上海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工人放弃罢工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也表现出了两面性。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极力破坏“三罢”斗争。提出“此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他与工部局、日法领事密谋，商讨对付“三罢”的办法。6月10日，上海总商会决定成立五卅委会员，由虞洽卿、方椒伯等21人组成，企图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争夺运动的领导权。 11日，五卅委员会提出了交涉条件“13条”。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作了原则性地篡改。删去了“17条”中“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主要条款；删去了“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而代之以“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便。”

“13条”充分暴露了五卅委员会嘴脸，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破产的。上海总工会以及学生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抗议和反对上海总商会的妥协、让步行为。6月18日，6国调查委员会与特派员的谈判破裂。“13条”也彻底破产了。这是因为，“全国的根本要求是废除自通商以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取消外人在中国一切不法的特权”，“哪一个不承认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全国一致反对他”。

上海总商会在“13条”破产后，仍然执行其妥协路线，急于要开市，退出“三罢”斗争。6月25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开市宣言”，决定于26日开市，但仍“努力于抵制英日货与停工工人之援助”。各马路商店于26日、27日先后开市。不久，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

鉴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8月1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斗争。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8月中旬，驻沪日本领事与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商讨，最后由日本纱厂同业联合会发表声明，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工厂无故不开除工人，工厂日人入厂不带武器，工人罢工期间损失的工资由厂方予以帮助等6项条件，并给予顾正红家属抚恤金1万元。日厂的罢工，至此解决，工人于8月25日全体复工。接着，海员、电力工人、英厂工人等在资方承认了一定条件下陆续复工。到9月底，上海各工厂全部复工。上海总工会也被

迫转入地下，仍继续指挥上海工人的斗争。

四、革命风暴的扩展

“五卅”惨案的发生，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迅速在全国燃起。各地人民成千上万地涌向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遣责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持上海人民的斗争，使“五卅”运动迅速扩展为一场全国的反帝大浪潮。。

6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电告全国各工会各团体，请一致援助“五卅”案。同日，全国学生总会也发电各地，望各地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活动，并派代表分赴各省宣传。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反帝斗争中来。

北京学生首先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6月1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提出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惩办行凶捕头、撤换英日领事等要求。3日，北京师大等数十校宣告罢课，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学校百余所，5万余人。5日，北京各界280多个团体决定组织“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10日，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召开“北京国民大会”。会议情景正如一位记者所述：“九城内外，相望于道，天安门才前，肩摩踵接。自青年学生以至六、七十岁之老妇，莫不争先恐后，同表义愤。”到会者20余万。会议发表了宣言，并冒雨进行游行。13日，北京商界55行代表集会，决定不用英、日钞票，不供给英、日本人粮食，不买卖英、日货。25日，北京30万市民又在天安门集会，举行了总示威。30日，北京500多个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

在天津，6月5日，各中等以上学校5000余人在南开大学集会，议决惩凶、偿赔等7项交涉条件。下午，各校师生数万人游行示威，并从5日起罢课13天。30日，各界约10万人举行了总示威，追悼“五卅”烈士，游行队伍“首尾相望，约有八、九里之遥。旗帜蔽空，呼声震天。”

在西安，6月20日，学生们对英、日屠杀同胞举行雪耻会并示威游行。次日，各界又召开市民大会，到会者10万余人。22日，西安8000多人力车工人罢工。学界组织六路代表团，分赴各县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广州、南京、武汉、长沙、济南、杭州、徐州、青岛、大连、唐山、郑州、开封、成都、重庆、宜昌、汉口、株州、南昌、九江、镇江、苏州、扬州、宁波、福州等地的人民群众，也都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罢课、罢市，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这次运动的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势头之猛，都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广大地区的农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把广大农民组织在“雪耻会”里，使湖南农民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北京市郊农民成立了“沪案雪耻会”，并进城进行反帝游行。广东海陆丰还举行了反帝的农民武装游行。各地农民的反帝斗争，有

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斗争。仅广东各地参加“五卅”反帝示威的农民，就有 50 多万人。

“五卅”惨案和上海人民斗争的消息，遍及五大洲的 700 多万华侨、中国留学生，他们纷纷捐钱、捐物，支援“三罢”斗争。侨胞捐助款项就有 200 多万元，充分表达了侨胞的爱国热情。华侨集中的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的华侨，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声讨帝主义的罪行。新加坡华侨决定与香港工人联合行动，于 21 日举行总罢工。在“五卅”运动中，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参加了爱国反帝斗争。

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6 月初，列宁缔造的第三国际发表了《告世界工人农民书》，号召全世界工人，东方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要求各国共产党和世界工人阶级全力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6 月 12 日，莫斯科举行了有 50 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苏联其它城市也举行了集会。苏联工会还派代表到上海慰问上海总工会。

柏林国际工人后援会、法国劳动同盟先后寄款给中国工人。英、美、日、朝鲜、埃及、印度等国的工人和革命团体，都分别向中国工人表示同情和援助。

世界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了正在斗争的中国人民，扩大了“五卅”运动的国际影响。

在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运动而爆发的各地罢工斗争中，1925 年 6 月 19 日开始的省港大罢工，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得知“五卅”惨案的消息后，立即派苏兆征、邓中夏去发动罢工。罢工首先从香港各业工人开始，继之广州沙面租界工人罢工。6 月 23 日英帝国主义枪杀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游行群众，当场打死 50 多人，伤 170 多人，制造了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后，香港罢工工人激增到 25 万，并有 13 万人陆续回广州。由于罢工，使香港对外交通中断，该运进来的运不来，该运出去的运不出去，使航运业受到极大影响，香港变成了“死港”。由于清洁工人的罢工，街上垃圾遍地、堆积如山，住楼房的人因下水道堵塞，使各种生活垃圾扔到了大街上，加上夏天炎热，臭气薰天，香港变成“臭港”。1926 年省港大罢工结束。这次罢工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推动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也说明，只要各阶级阶层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诚如马克思所预见的：“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上，而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很明显的指明：中国人民已觉悟，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不多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临死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伟大的“五卅”运动，发端于上海，遍及于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工

人阶级到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具有运动的广泛性，自觉性和组织性。这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发动、有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声势之猛，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五卅”运动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反帝斗争的新纪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五卅”运动还是一场深刻的宣传教育运动。它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也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只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五卅”运动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已广泛深入人心，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斗争目标，正为人民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尽管她是一个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的党，但“假如没有共产党的政策，决不会有‘五卅’运动的发生”。她的正确领导，证明她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最勇敢的反帝先锋队。这个运动使党壮大了自己，得到了发展。1925 年 1 月，中共党员总数近 1000 人。到 10 月增加到 3470 人。“五卅”前，中共上海区属 26 个支部，220 名党员。到 1925 年 10 月，支部增加到 75 个，党员有 1080 人。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逐渐成长起来，革命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革命骨干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北伐大革命作了准备。经过“五卅”运动锻炼的工农群众组成的北伐先谴队——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力量。

“五卅”运动的斗争实践还证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进行反帝斗争的有力武器。但反帝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才能实行彻底的反帝路线。在“五卅”运动中，全国有 50 万工人参加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所表现出的反帝斗争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去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

“五卅”运动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